

《水浒》是一部
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77.41

山东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评《水浒》中的宋江

.....雅 林 (9)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思 (17)

宋江是怎样搞投降主义的？

.....安徽劳动大学 江 南 (25)

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忠君思想

.....安徽师范大学 闻 工 (33)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38)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解放军某部 刘祯祥 聂敬华 (44)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

——读《流氓的变迁》

.....梁 效 (50)

评投降派宋江

.....柏 青 (57)

谈《水浒》的结局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
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65)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柏 青 (70)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

两千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播起过无数回农民起义的战鼓，兴起过几百次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那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宣言，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决心，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它铭刻在多少代劳动群众的心头，激励过多少代革命志士去战斗。

然而，在《水浒》这部书中，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抗斗争，却被颠倒、被歪曲、被否定了。它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农民肆意贬低和丑化。投降路线被百般歌颂，革命路线被横加指责。一句话，宣扬投降，反对革命。

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受压迫

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反抗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农民的革命造反意识更加强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十分痛恨榨取他们血汗的剥削者，认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有着充分的正义性。和历史上宋江同时起义的农民英雄方腊，就曾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了这个正义性。他控诉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他大声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群众奋起造反。但是，《水浒》却污蔑方腊是“江南草寇”，把方腊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行动说成是“残害”百姓，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有罪”论者；他把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造反上梁山的革命行动污蔑为“犯了迷天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直到上了梁山，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他依然攻击起义军“造恶甚多”，“罪恶迷天”。

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李逵为代表的梁山起义军广大战士，和黑暗的封建统治是势不两立的。李逵主张推翻宋王朝、夺取政权。在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他蔑视皇权，粪土王法，不仅敢于闹县衙，打钦差，而且把皇帝的御座称为“鸟位”！他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是，这种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却屡遭宋江等人喝骂，被斥为“胡言乱语”，“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相反，宋江对赵宋皇帝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在梁山起义军中，他多次公开宣称，只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表白自己“怎敢

背负朝廷？”甚至对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他也是煞费苦心地百般回护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等到一受招安，便立刻张贴告示，肉麻地吹捧起“天子宽仁厚德”来了。直至最后喝了御赐的鸩酒，他仍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水浒》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

列宁说：“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矛头都是对着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头子封建皇帝的。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农民革命英雄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封建皇帝头上的金冠打得滚落尘埃！这才是农民革命的真实记录。

是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腐朽的孔孟之道，还是“全忠仗义”，死守儒道作奴才？《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孔孟之徒。对封建皇帝，他讲“忠”。所谓“忠肝盖地”，“尽忠报国”，“忘生报国，万死不辞”。《水浒》为了宣扬这个“忠”，在宋江死后还让他的鬼魂跑到宋徽宗的梦里“垂泪启奏”，表示忠心。对地主老子，他讲“孝”。宋江很讲究“昏定晨省，以尽孝敬”这一套。晁盖劝他上梁山，他就抬出“孝”的招牌加以拒绝，说什么“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万万行不得。对朝廷派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

队，他讲“恕道”。在起义军战败官军之后，宋江总是勒兵不追，说什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每当俘获反动将领时，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一副奴才相。尤其毒辣的是，宋江还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内容来篡改体现革命农民团结造反的“义”，使它服从于忠君这个封建思想的最高原则。孔孟之道，是宋江麻醉农民起义军的精神鸦片，也是他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反孔斗争。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这种反孔斗争正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把孔孟之道的黑幡，冒充成指引农民革命的战旗呢！

是反对投降，还是跪求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毛主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就是一个热衷于受招安的投降派。从对上二龙山的武松临别赠言，到“菊花会”上赋诗明志；从劝说被俘军官上山，到接招安诏书时山呼万岁，处处说明宋江这个家伙盼的是招安，等的是招安，求的是招安。更有甚者，《水浒》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宋江亲自出马，钻营门路，乞求招安的场面。宋江也是去了东京的。不过，他不是如李逵所主张的那样“杀去东京”，怀着胜利的喜悦踏翻金殿的御座，而是乔装打扮，带着奴才的笑脸溜进妓女李师师家里，企图通过她“告一道招安赦书”，效法孔老二，上演了一出“子见南子”式的丑剧。

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是反对招安，不愿意投降的。

列宁指出，“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出身赤贫的李逵，被压在封建社会的最低层，与封建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革命是很坚决的。他手搭双斧，声喝如雷，在多少次激烈的大小战斗中，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斗争是何等的勇敢。他大闹“菊花会”，对宋江提出的求招安主张非常气愤，一脚把桌子踢翻，痛斥宋江：“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旗帜是何等的鲜明。可是，《水浒》为了贬低和反对农民革命路线，肆意丑化李逵等革命农民的形象，总是以他们屈从宋江为结局，借此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完全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一部中国农民革命史，充满了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事迹。他们抱定“一入兵阵，视死如归”的决心，谱写了一篇篇英雄的乐章。当然在农民起义中会出现一小撮叛徒，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则是由于封建思想的腐蚀而蜕化变质的，他们是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根本代表不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英雄们不但有对反动统治者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而且勇于同投降主义路线毅然决裂。唐末农民起义时，王仙芝多次乞求招安，准备跪受唐朝给的“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对这种无耻投降的行径，农民起义军广大将士十分愤慨，群起责骂和反对，他们与王仙芝决裂，转战南北，坚持斗争。这才是我国农民起义真正的光荣传统。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总要反映到农民革命运动中来。判定一条政治路线，主

要看它的阶级实质，看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水浒》宣扬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路线，而是一条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死心塌地地拥护皇帝，以便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每当阶级矛盾激化，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集团，可以在反对贪官、澄清吏治的骗人幌子下，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目标。《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发迹，把高俅作为对立面，接着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然后又写宋江不满蔡京，私放晁盖，惹出杀惜之祸；直到刺配江州，酒后题诗，弄得差点丢了脑袋，以及宋江骂高俅一伙是“滥官”，“污吏”，是“闭塞”皇帝的“奸臣”，处处突出的是宋江一伙同高俅的矛盾。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力图利用这个纲领来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实现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的目的。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保皇帝也保贪官。在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之后，起义将领在水里活捉了这个恶贼，把他象落水狗一样扔到“忠义堂”下时，宋江却“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为了得到皇帝的招安，此时此刻，宋江连他标榜的反贪官的口号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农民起义，反动阶级总是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

骗这两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出现投降派。当统治阶级由军事镇压转变到招安为主的策略时，投降派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狂。招安是反动统治阶级瓦解和消灭农民革命队伍的反动政策，是政治欺骗的集中表现。“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宋王朝正是在武力镇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用招安这种“怀柔”政策，达到了“伫看梁山尽束装”的目的。当宋王朝的统治者变换策略时，宋江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实现了赵宋王朝的愿望，干了反动派用武力所做不到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宋江这个叛徒，在反动统治者那里一时身价倍增。皇帝赞扬他：“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叔夜，也“不爱黄金爱宋江”。这说明，宋江的路线，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梁山起义军不是在困难重重、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高潮中缴枪投降。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革命事业的胜败。这是一个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作为在制定和推行路线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状况如何，是极其重要的。在晁盖当权、执行正确路线的时期，梁山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山寨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宋江这个家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山的。在他临上山时，曾信誓旦旦地向晁盖表示：

“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然而，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

词也没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用《水浒》的话来说，就是“凭陵欲作恢怵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水浒》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叫晁盖“归天及早”，让宋江“把寨为头”，就是为了宣扬“瞻依廊庙”的投降主义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坐上头把交椅，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实际上是把团结造反的农民革命路线，篡改为忠于宋王朝的投降路线。为了实现这条路线，他不惜一切把对农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地主卢俊义拉入领导集团。

梁山起义军之所以在战绩卓著的形势下被拉上投降道路，就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将士在战役中的一个胜利，不但不能成为坚持革命斗争、扩大战果的基础，反而被宋江作为搞投降主义，与赵宋王朝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的筹码，和加快实现招安步骤的条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梁山泊这个农民革命的堡垒正是被它内部投降主义的首领人物宋江搞垮的。

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主义者。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原载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评《水浒》中的宋江

雅 林

《水浒》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维护封建统治 反对农民革命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到处点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是被压迫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当权集团和非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解剖《水浒》中的宋江，就要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是拥护农民革命，反抗封建统治，还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宋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脑子里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他怀着一片“报国”的忠心，时时想着能施展自

己的政治抱负，得遂“凌云志”。但是，当权既得利益集团“非亲不用”，使宋江这个下层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职位，挤进当权集团的行列。不仅如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象宋江这类不“当道”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时时有被咬死咬伤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宋江，事先营就了“狡兔三窟”：一是准备了戮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时牵连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逃跑去处。宋江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尽管他善于“忍受”，但也免不了时常发泄牢骚。一次，他劝武松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些用来勉励武松的话，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接着，他怅然地说：“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宋江和当权集团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吟“反诗”这个行动上。有人说：宋江的“反诗”，表明他决心反抗不合理的现实；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诗”表现了宋江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反诗”到底反不反？

宋江自“杀惜”流落江湖后，命蹇事乖，不但没能“得进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他独自一人，登楼饮酒，眼前的美景和自己的处境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他心里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为封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但不被赏识，反而成了个被充军的囚犯，使这个以“猛虎”自喻的宋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在“不觉沉醉”中，无限心事“蓦上心来”，借酒醉吟诗，把这种心情直接

表露出来了。在这里，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发泄了自己对“当道”的“贼臣”的不满。趋炎附势的“刁钻之徒”黄文炳，把这两首诗说成“反诗”，是因为他一心想通过抱当权集团的大腿，“引荐出职，再欲作官”。他抓住了宋江的把柄，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功领赏了。宋江对黄文炳把他的诗定为“反诗”并不认账，他十分委屈，万分恼火。大闹江州之后，他还向梁山起义军头领一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并无反意。可见，宋江的“反诗”并不反，宋江也并不是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宋江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施小恩小惠，经常给这人买一副棺材板，给那人一点药钱。他的这一套本来是为了笼络人心，掩盖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当农民拿起武器造反时，他的反动立场就立刻暴露无遗。当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夺了要送给蔡京的“不义之财”后，他出于朋友的私情救了晁盖，但对晁盖等的革命行动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抗拒官兵，不断发展革命事业，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牵连，所以“杀惜”后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庄园。大闹清风寨后，宋江闯了大祸，曾“乘兴”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书，使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闹，骂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为”，没有一点犹豫，连夜开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阶级的怀抱。回到家里遭到追捕，他表示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污蔑农民起义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宁可当

“囚徒”，不愿当“匪徒”。在充军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起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看，他仇恨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宋江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表面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实际上是个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他甘心充军，不去梁山，是因为“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不去躲藏也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在浔阳江头，当真的遇到脑袋搬家的危险时，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后来，梁山起义军把他从刀口下救出，大闹了江州。此时，虽然他仇恨农民革命的思想丝毫没有变，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宋江最后被逼上梁山，是由于往上爬的希望破灭了，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换门庭，另搞一场政治投机，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夺领导权 推行投降路线

宋江上梁山后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评论说什么：宋江上梁山后，作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只因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兴旺”，才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正确地评论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

上梁山后推行了一条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路线，是搞革命还是搞投降。离开了路线这个纲，就丢掉了分析宋江形象的根本标准。

在农民革命领袖晁盖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要阴谋搞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